

公刘:1955—1957

李文钢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1955年,诗人公刘奉调由云南进京,入职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命运从此发生较大转变。他因“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成为“特嫌”而被“重点审查”。1956年夏,公刘重获自由后,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却在1957年被批判为“右派分子”。公刘在1955—1957年所经历的一系列波澜,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他后来诗歌创作思想的一个窗口。

[关键词]公刘;诗歌;传记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4-0086-1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4.012

A Contemporary Poet Gong Liu from 1955 to 1957

LI Wen-g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Abstract: In 1955, the poet Gong Liu's job was transferred from Yunnan to Beijing, and he joined the creation workshop of the Cultural Department of the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ince then, his fate had been greatly changed. He became a "special suspect" in the "Campaign to Eliminat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due to "historical issues" and was "specially investigated". After regaining his freedom in 1956, he ushered into another creative peak, but was criticized as a "rightist" in 1957. The series of tortuousness that Gong Liu experienced from 1955 to 1957 could be taken as a window for us to understand his later poetry creation.

Key words: Gong Liu; poetry; biography

1954年5月,时任昆明军区文化部文艺助理员的公刘,^①在南国边疆的阿佤山永必烈哨所一座完全用竹子建筑而成的兵营中,写下了名作《西盟的早晨》:

我推开窗子,
一朵云飞进来——
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

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在哨兵的枪刺上,
凝结着昨夜的白霜,
军号以激昂的高音,
指挥着群山每天最初的合唱……

早安,边疆!

收稿日期:2020-04-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50002)

作者简介:李文钢(1979—),男,河北青龙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早安,边疆!
带枪的人都站立在岗位上,
迎接美好生活中的又一个早晨。

这首诗,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12月号,持续为公刘带来了巨大声誉。1955年7月15日,著名诗人艾青在《文艺报》头条发表《公刘的诗》一文,便引用了这首诗的首节说:“我想以一个新的诗人的这几句诗,来开始介绍一个新的诗人。‘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正好用来形容公刘的诗。”他还这样写道:“公刘的诗,就是长期生活在战士中间的、感染了我国部队的高贵素质的、通身都是健康的一种新的歌唱。”^[1]艾青的这个评价,也代表了当时的诗坛对他的印象和认可。

此时年仅28岁的公刘,已于1955年初,离开生活了五年的云南,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简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②并开始草拟电影剧本《阿诗玛》的提纲。1955年5月1日,他受邀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游行表演,当晚又参加了长安街的群众狂欢。这代表着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还可被看作是一种值得珍视的个人荣誉。公刘曾在为他的诗歌偶像艾青撰写的评论中开篇写道:“诗人是人的花朵”^[2],那一夜,大概也是他作为“人的花朵”绽放得最为绚烂的时刻。5天后,公刘根据自己当晚的印象,写下了一首题为《五月一日的夜晚》的诗: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
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
数不尽的衣衫发辫,
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

半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
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
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作为一个21岁时曾因参加学生“地下活

动”而被国民党通缉,而后被迫逃亡香港,又于1949年义无反顾地返回大陆入伍参加解放战争的战士;作为一名13岁就在报纸上发表诗作,并在1953年出版了自己首部诗集《边地短歌》的诗人;此时公刘的内心,想必也如同这首诗中所渲染出的氛围那样,充溢着朝气蓬勃、春风得意的激动和兴奋。

1955年6月2日,公刘在为即将出版的第二部诗集《神圣的岗位》撰写的后记中,信心满满地写道:

收集在这里的十七首短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几年来重大政治事件和响应了各个时期的斗争号召。我自信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在写作过程中,我希望能够通过它们达到宣传的目的,同时,我当然也希望它们是诗。我之所以写下它们,完全是出于责任感,出于真实的激动,而不是出于害怕什么“理论”的“刀子”或者“棍子”。我以为,我们的诗歌为政治服务不是太多,而是太不够和太不好。我们都应该努力学习马雅可夫斯基,继承和发扬他的战斗精神。我确信,做工人阶级的真理的宣传员,乃是写诗者应该毕生追求的最大的光荣^[3]。

和诸多沉浸在新中国成立喜悦中的青年诗人一样,此时的公刘也决心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要用诗歌热情地为政治服务,为党的宣传服务。与公刘的心态十分相似的邵燕祥先生,在近50年后的2004年1月5日撰文回忆公刘时,曾动情地写道:“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是我力求追赶的诗中兄长。那时候,我想,二十年代是郭沫若《女神》时代,三四十年代是艾青《大堰河》《向太阳》时代,如今该是有几副笔墨、驰骋于短诗长诗小说电影间的公刘领衔一个时代了。一些写诗的年轻朋友都这么盼望着。没多久,盼来的却是意外之灾,公刘落难了。我们对‘公刘时代’的期待落空了。”^[4]

这场意外之灾与胡风有关。1955年5月

13日,也就是距公刘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狂欢之夜12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同时还刊发了根据胡风写给舒芜的信件摘录而成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反党集团”的罪名,被扣在了胡风及与其有密切往来的人员身上。不久,公刘的好友、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田庄,也因此受牵连被隔离审查。但此时正值春风得意之际的公刘,丝毫没有意识到所谓的“胡风集团”会与自己有关系。因而,当他与很多军旅诗人、作家一起被总政主管部门召往广安门外莲花池进行“集中学习”时,仍是怀着毫不在乎的心情前往的。

关于莲花池的这个学习基地,同为亲历者之一的作家洪炉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当时所住的莲花池畔,算是一处风水宝地,不仅一度是军中人才特别是文才荟萃之地,更是我国军事电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发祥之地。我们所在的那一片平房,原属一家“振华制砖厂”,不知何时何故倒闭停业了,换上了一批穿军衣的“白领工人”,一个个也如“革命一块砖”,由上级从东西南北“搬”来这里,在制砖厂旧址,生产出了一批批也是方块却是印在纸上的“砖”。那时在这里制“砖”的,有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而一举成名的作家兼诗人魏巍,刚出版中国军事文学扛鼎之作《保卫延安》的杜鹏程,以及来自各军区各部队的文坛老兵和文学尖子,如周洁夫、西虹、寒风、胡奇、刘伍、韩希梁、徐怀中、陆柱国、白艾、白桦、顾工、公刘和二三十年代就出名的老作家蒋牧良等等,还有原是我们一个部队,正以《柳堡的故事》和《渡江侦察记》等名作而走红文坛的胡石言、沈默君以及新兵老艺人黄宗江等等。除了这批知名作家诗人,许多军中著名画家也在这里,他们是黄丕星、高虹、艾炎、关夫生和本来资历最浅却后来名气最大的黄胄等等。当时他们属于正在组建中的总政创作室,和我们《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合编为一个党支部,业务上统归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和

文艺处长虞棘、编审处长马寒冰等领导^[5]。

莲花池畔那几排兵营式的低矮建筑,与公刘所熟悉的军队生活本来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开始学习的第三天,政治考验便来了。据公刘回忆:

搬进莲花池的第三天,(总政文化部)电影处处长、新任创作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虞棘就找我个别谈话,通知我,马上就会有一个名叫蓝曼的人,分配与我同室居住。虞说:此人是重点审查对象,很可能是个军内胡风分子,党组织交给你一项任务,记下他说的每一句话,包括你能听到的梦话,留神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报告。

党这般信任人,膺以重任,我本当感激涕零才是,可是,我却当场拒绝了,表现得既恶劣又愚蠢,用我老家的俗话形容,这无疑叫做“狗坐轿子不识抬举”^{[6](P63)}。

如此看来,要用诗歌为政治服务的诗人公刘,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政治头脑”。因此事而“得罪”了党支部书记虞棘,他很快便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因为一个“历史问题”而成为了“特嫌”。这个给公刘带来灾难的“历史问题”发生于1938年夏。因日军进犯南昌,公刘父亲^③供职的江西省立戒烟(鸦片烟)医院迁往赣州,公刘和家人也随父南迁。到达赣州后失学在家的公刘,一日在街头见到一张告示: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抗敌宣传队开办抗敌歌咏班。自幼喜欢音乐、小学阶段便常常登台表演歌曲的公刘马上报了名。这个抗敌宣传队队部所在地,与蒋经国领导的新兵督练处紧挨在一起,分驻赣州公园里面毗邻的两栋小洋楼。在参加歌咏班的排练时,公刘动情的演唱不仅得到了队友的热烈掌声,还获得了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期间的同窗好友、也是蒋经国主任秘书的徐君虎^④的赏识。喜爱孩子的徐君虎对公刘和另一位与公刘年龄相仿的男孩万水生异

常亲热,每天问长问短,格外给予很多关心。经由徐君虎,公刘和万水生与蒋经国也有了接触。为了解决公刘和万水生的上学问题,徐君虎还请蒋经国出面,给江西省赣州中学校长周蔚生写了介绍信,为这两个失学孩童开辟了进入中学继续读书的通途。

关于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公刘始终毫不避讳,因为其中并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隐情。1948年,公刘因在中正大学从事“地下工作”而被国民党通缉,逃亡香港参加全国学联工作时,便曾坦然就此事写过交代材料。后来在1949年从香港返回大陆参加解放军时、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及1953年提交入党申请时,又曾经分别就此事写过更详细的交代材料,可谓十分坦荡。

但在“肃反”运动中,总政文化部有人偏拿出这个“历史问题”举报,硬说公刘与蒋经国“有不可告人的黑关系”,逼问他“蒋经国是怎样亲自培养你当特务的”。作为重要当事人,时任湖南省政府参事的徐君虎为外调人员提供了对公刘有利的证词,他说:“我徐君虎从未认刘仁勇(公刘少年时代的学名)为义子,义子倒是有一个,那是万水生,不是刘仁勇。”^⑤然而,以党支部书记虞棘为中心的几位作家、诗人却抓住这一线索,发挥想象力,杜撰出了很多离奇古怪的故事来。在公刘的“肃反”审查结论上,仍是被记了一笔:“公刘……曾是蒋经国秘书徐君虎的干儿子。”^{[7](P399)}

面对这一明显带有虚构色彩的结论,公刘坚决地提出了删除的要求。但党支部书记虞棘却断然予以拒绝,理由是:这个结论是根据公刘在1954年提交的入党自传中的记叙做出的。关于这份自传,公刘曾回忆说:

我在一九五四年交的入党自传是怎么写的,幸亏我还记得清楚。尽管这份自传早已入档,我无法翻出来字字照抄。但,当我叙述少年时的社会政治经历时,是本着对党交心的绝对坦白态度,充满了自我批判精神,连自己的“潜

意识”都彻底解剖了的。记得,我用文字表述过如下的思想内容:

抗敌宣传队的男女队员们,觉察到徐君虎对我们(指万水生和我两人)异常亲热、关心,便起哄逗他:“徐秘书你干脆认他们做干儿子吧。”徐笑而不答。我回家后,却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母亲,父母亲的反应是高兴的,认为:“真要认了干儿子,倒是你的造化。”父母亲的倾向是明显的,加上旧社会的攀富结贵的恶劣习气,于无形中熏染了我,使得幼小的我,心里也就萌生了希望它能成为事实的私愿……

这就是他们所依仗的、所谓公刘本人提供的全部根据!

今天细想,其实,我的上述表白,本来就是过火的:第一,我没有任何争当徐君虎先生干儿子的明确表示;第二我对别人的起哄,并无喜形于色的反应。这个无反应,或许该归功于世俗的另一面,它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阻力。因为,在南昌人日常的人际关系准则中,说谁是谁的“干崽”(即“干儿子”)是骂人话,是有损人格的。这就造成了我的心理障碍,虽说完全是善意的玩笑,也觉得不好随便接受。何况,日后我进大学学的是法律,自然更明白,凡是虚拟的东西,推论的东西,分析的东西,是无论如何都不应当作客观事实看待的。因之,那时的我,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觉悟”,早已逸出了实事求是的范围了^{[7](P400-401)}。

公刘本是抱着向党交心的动机解剖自己潜意识中虚拟的愿望,却被掌握着公刘命运的权势者当作了客观事实看待,背后显然有着上纲上线的强烈动机。

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陈沂,在听到关于公刘事情的汇报后,也大为诧异,在他撰写的《同老虎睡在一起是不行的》一文中提到:“原来这些家伙一经揭开伪装,都是一群吃人的老虎,我们好些人多年来都是和这些老虎在一同睡觉的,现在该醒了,同老虎在一起睡是不行的。‘你不吃他,他要吃你’,中国的古话老早就告诫

着我们。”^[8]据公刘回忆说,尽管陈沂在文中尚未公开点名,但熟悉文坛状况的人,一看便知陈沂所说的“老虎”就是自己^{[6](P64)}。原本无意于“吃人”的公刘,此时被当作老虎提防,也被当作禽兽一样折磨。据当时任解放军文艺社编辑,曾与公刘同在莲花池学习的诗人冰夫回忆:“(公刘)是小组重点审查的对象,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一段时间完全丧失了行动自由,连上厕所也有人紧跟着他。”^[9]

当时在八一电影厂任编辑,也一起在莲花池参加“学习”的顾工,曾这样讲述那时的批判场景:

公刘坐在他那低垂着蚊帐的铺板上开始交代:曾在全国学联的地下刊物当过编辑,在香港的“生活书店”当过社会科学导师,在香港“文汇报”当过编辑……行了,什么事一牵扯到“地下”和“香港”,那就疑云笼罩,疑团丛生。组长叶一峰带头开炮,于是全小组的炮队,跟踪推进,向纵深发展……质问、声讨、痛斥……象一枚枚烈性炸弹,炸得小屋几乎屋顶飞天!公刘,和每个遭受“疲劳轰炸”的人们一样,开始失眠,辗转反侧……一夜一夜又一夜,怕再发生郑洪那样的“轻生”事件,便在他床头也挂上一盏一百支光的灯泡,照得他高耸的额头也熠熠放光……

(公刘在肃反结束后进入反右时,他很快就被划为右派。据说他的反动言论之一就是:我们那“肃反学习班”简直比集中营还厉害;集中营的探照灯,不会整天整夜地挂在你的脑瓜顶上!)

公刘“挂”起来以后,组长让我负责“监护”。这“监护”就是要对他的生命安全,行动安全全权负责。哎!这伟大的使命可把我给紧张坏了。晚上睡觉我都不太敢合眼,怕公刘一时想不开……于是,他失眠,我只好硬撑着也陪他失眠。由于饮食粗糙不洁,公刘又大闹肚子,没日没夜地跑厕所。我们住地只有一个肮脏的公厕,在莲花池的苇塘边上。这是个最为危险的地带,稍往前多迈两步,就可在淤泥中享受没顶

之灾。于是,他跑肚,我也跟着跑;他蹲在厕所里面,我蹲在厕所外面。在薰天薰地的臭气中,我默默祈祷、祝福:让公刘的痢疾早日痊愈;让公刘的问题早日解决……我的祈祷和祝福,不仅仅是为他,更是为了我自己;再这样熬下去,拖下去,他受不了我也受不了……^[10]

负责审讯公刘的人到点换班,但公刘却不能休息,只能接受24小时的疲劳轰炸。在公刘的精神和体力都彻底崩溃之际,公刘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竟开始为自己编造被吸收进蒋经国直接指挥的特务组织的经过,胡说自己是从香港潜入大陆的美蒋特工。负责审讯他的“打手”厉声向他追问:“快交代!你都发展了谁”,昏乱之际的公刘无奈地被迫说出了几个人名。关于这段经历,公刘在1991年2月4日撰写的《无论是“得”是“失”都充满了忧伤》一文中这样回忆道:

记不清那是第几番难以忍受的车轮大战了(一般为48小时的疲劳轰炸,审讯者到点换班),我的精神与体力均已彻底崩溃,就在这万念俱灰的一刹那,我“供”出了自己于何时何地以及怎样“被吸收”进“蒋经国直接指挥的特务组织”的“经过”……开始,我还坚持编造假人假事,但当军威大振的审讯者们点名追究几个被怀疑的朋友时,我完全被逼到墙角了,真是欲哭无泪啊!为我命运掌舵的已经既不是理智,也不是上帝,我仅仅凭着人的自卫本能挣扎。不过事后回想,这里倒有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不妨请心理学家研究——从他们要我指认的一串名单中,我居然有所选择,估计有可能导致事态复杂化的人,一个也不应承;凡是我点头的,要末相当了解,要末根本不了解属于一面之识。这大概表明我的潜意识还寄希望于死后真相大白。

借此机会,我愿提着我的始终滴血的心,向被我无端株连的王平先生、谢章生先生(现名谢长辛)和林予先生(本名汪人颐)谢罪^{[6](P65-66)}!

1955年8月的一天中午,备受羞辱的公刘想要以死明志。他写下了一纸绝命书,大意是:“既然党需要特务,我只好来当这个特务。可是,我被迫提供的一切全是假的,千万不要冤枉了好人,我没有办法。我对不起他们。”^{[6](P66)}趁着午休人们昏昏欲睡之际,公刘瞅准了一棵树,拿起伙房外边的长凳,准备一死了之。幸亏一位炊事员发现了他,并喊叫起来,“结果解脱未成,罪责反而加重;看管者黄宗江也因不尽职守受到批评”^[11]。度日如年的公刘,一直熬到了第二年盛夏的一天,才终于迎来了对他的甄别结论:怀疑公刘为“国民党特务”的案件被宣告“不能成立”。公刘说:“我明白,这多亏还有不少主持正义、实事求是的好人。例如,负责外调的史超先生、刘大为先生等。”^⑥

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反胡风—肃反运动”,创作室的支部书记虞棘最终也没能将公刘“肃”成“反革命”,难免心气不平,这也为他后来在“反右”运动中,首先将公刘抓来做典型埋下了伏笔。公刘曾就此回忆说:“1957年,我在不曾‘鸣放’,也从未写过大字报的情况下,被从甘肃敦煌莫高窟电召回京,并且不由分说地扣上‘右派’帽子,斗得死去活来。毫无疑问,这和创作室领导人1955年肃反‘肃’了我一年整,却没能把我‘肃’成反革命,实在心气难平,是有密切关系的。”^{[7](P402)}

公刘在“肃反”这一年(1955年5月—1956年5月)中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全部凝结在了他的一首题为《鲜血与诗歌》的诗作中:

假如我要死去,
我的每一滴血,
都将渗透到地下,
鲜血,和诗歌一样,
能营养我的国家。

我的声音将活着,
但同时也将沉默。
就让它沉默吧,

它愿听新的歌;
听新歌,是最大的快乐……

此时,重获自由的公刘,再次振奋了起来,要创作“新的歌”。他应陈荒煤的约请,于1956年夏赴上海参加电影学习班,同时也拾起了此前被打断的电影剧本《阿诗玛》的写作,并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定稿,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4期。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看到公刘的剧本后,立即组建了以凌子风导演为首的摄制组,开始看外景、选演员,可惜摄制工作后来因公刘被划为“右派”而停了下来。1956年10月,公刘用这个剧本的稿费,与他在昆明曾经共事过的战友徐怀中、彭荆风等人一起赴杭州旅游。第一站,便是去参拜岳飞元帅的墓地,风瑟瑟而柏森森的氛围,给公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说:

有一段古柏的化石吸引了我的视线,也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摩挲着,摩挲着,仿佛那是鄂王岳武穆的英烈遗躯。我当然不相信那个古柏与岳飞同年同月同日死去的离奇故事,然而我又的确希望真是这样!甚至认为不可能不是这样!于是,回到旅舍便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小诗,题目就叫做《岳王坟前,有一段古柏》^[12]。

这首创作于1956年10月8日的诗,^⑦连同一首《西湖绝句》和两首《怀古》诗一起,总题为《杭州诗稿》,发表在1956年11月(当年第22期)的《新观察》,日后成为了他的“右派”罪行之一。诗中这样写道:

岳王坟前,有一段古柏

公元1142年,岳飞被昏君赵构、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罪名诬杀于风波亭。岳飞遇害后,亭畔的一株古柏随之枯死,僵立不仆,达六百余年。清代,人民为了纪念岳飞,特将这株古柏的一段,移至岳王坟前。

岳王坟前有一段古柏，
它和岳飞并非生在同年同月，
却和岳飞死在一个时刻。

南宋残破的半壁河山，
全靠岳飞和它共同支撑；
岳飞既然死去，古柏怎能偷生？！

那时间天昏地暗江潮呜咽，
岳飞和古柏相对默默无言，
八千里路三十功名竟成等闲！

从此古柏脱尽枝叶，
把根子扎在人民心中，万年不灭，
而赵构早已化作尘土，秦桧只剩一堆废铁！

两首《怀古诗》的全文如下：

怀古(一)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杭州当过三年刺史；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更两度出守杭州。他们在任
时不但写下了许多千古传诵的名句，而且有着
重大的政绩。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有着远大抱负
而无从施展的人物。

踏遍青山，掬遍湖水，
都为了探访先贤遗迹；
何处有白居易的青衫？
何处有苏东坡的布履？
满怀壮志，屈居杭州小吏！
长夜忧愤，毕生颠沛，
只换得千钟黄粱、三百诗句……

怀古(二)

陆游是我国南宋时的大诗人，曾寄寓杭州
孩儿巷。他写下了为数惊人的爱国主义的诗

篇；中年投笔从戎，到过当时的最前线——汉中
一带，他是诗人和战士相结合的典范。我国诗
歌传统中的战斗性的特点，从他身上有着极其
突出的表现。

读书三万卷，
学剑四十年。
——摘陆放翁诗

腰间系剑，怀中揣笔，
走遍蜀山吴水，
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
报国无门，何处能跃马杀敌？
仰天悲歌，远望登高，
胡尘滚滚，难见中原风貌；
愿将《剑南诗稿》，
换取汗马功劳！

此时的公刘，全然不知他一年后的命运，正
以饱满的热情继续着他的歌唱，迎来了又一个
创作丰收期：1956年6月，诗集《神圣的岗位》
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人民文学》刊出
组诗《在北方》；8月29日，《人民日报》刊出诗
作《繁星在天》；9月，公刘与徐怀中等人合著的
诗集《骑兵巡逻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1
月，《人民文学》刊出诗作《上海抒情诗》；11月2
日，在《文汇报》发表寓言诗《刺猬的哲学》《乌鸦
与猪》；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诗作《在中
苏友好大厦的塔顶》和《南京路》；11月23日，
《人民日报》刊出诗作《谒鲁迅墓》；12月，诗集
《黎明的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2月3
日，在《文汇报》发表寓言诗《公正的狐狸》；12
月7日，在《文汇报》发表寓言诗《驴子的反抗》；
1957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写在烟囱上
的诗》，在《中国青年》发表《我在一九五六年除
夕的奇遇——1957年元旦献诗》，叙事诗集《望
夫云》也于同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7
年2月，在《诗刊》发表组诗《迟开的蔷薇》；4
月，《北京文艺》发表组诗《小夜曲》；5月，《长江

文艺》发表诗作《霓虹》……

同时,公刘的诗作也继续收获了评论界的热烈反响:唐祈在1956年9月30日的《文艺报》(1956年第18号)发表题为《一组出色的抒情诗》的文章,对公刘在1956年8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的组诗《在北方》予以热情的褒扬;1957年2月,宋兰在《诗刊》发表《黎明的城》一文,对公刘的诗集《黎明的城》进行了评介;1957年5月,《处女地》发表唐祈的评论《公刘的诗》,继续向读者热情推荐这位“新的诗人”,并说:“公刘的诗,总的看来,的确闪着光彩,我们可以预见到他诗创作上的光辉灿烂的将来”^[13];1956年秋,时任上海《萌芽》杂志编辑的姚文元,还曾经专门慕名到公刘当时居住的北京和平门北新华街总政宿舍向公刘约稿。

上述作品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刘1957年2月在《诗刊》发表的组诗《迟开的蔷薇》,这是公刘平生所写的第一首爱情诗。写这首诗时,31岁的公刘正在经历一场热恋,他曾向一位文友这样倾诉自己的这次恋爱经过:

31岁我才结婚,30岁之前一直颠沛流离,进入青春期之后,心事都放在革命事业和写文章的大事业上,再说我也知道自己虽然有点才华,但貌不出众……说我有自卑感吗,也不是。总之,与那些风流才子相比,应该说,我在这方面是没有作为的人……1956年,我的创作欲望如火如荼,这时,我在北京也有了个窝……有一天,我们单位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他夫人那里有一位从昆明师院来京进修的调干生,读了我的诗歌,很想见我一面……就这样,我与这位爱读我作品的湖南妹子相识了^[14](P205)。

这位曾经朗诵过诗歌《五月一日的夜晚》的女大学生,成为了公刘的第一任妻子。1957年春,公刘在总政文化部电影处和创作室共用的办公楼借用了一间屋子作新房,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但新婚的幸福没有持续多久,公刘说:

“我们裁了结婚证,她怀孕了,但是我发现我与她无法相处……我忍让着,痛苦着……更晴天霹雳的是:那年6月,我从青海回到北京,迎接我的是‘剥下公刘右派画皮’的批斗大会。正是这其间,她生下了我日后相依为命的女儿,作为母亲,她却拒绝给‘右派的女儿’哺乳……我背着我女儿到山西去劳改……我没有怨恨我的所谓的妻子,我只责备自己当了‘右派’,我写信给她,哀求她寄几块钱给我,好给女儿买件小袄,我得到的回信却是一张写着‘公刘,你这个大右派!’的明信片……”^[14](P205)。

甜蜜的爱情短暂即逝,只是留下了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几首爱情诗。然而,这几首爱情诗,不久也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1957年第9期《诗刊》,发表了黎之的文章《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公开批评了公刘的这组爱情诗。文章中说:“我们知道诗应该是时代的声音,应该是战斗的号角。但是在诗歌创作上前一时期却出现了低沉、忧伤的调子,出现了一些带有浓重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甚至资产阶级低级庸俗感情的诗。”在列举了几首其他人的“情诗”后,作者这样写道:

还应该提到的是“诗刊”第二期公刘的“迟开的蔷薇”:

盛夏已经逝去,
在荒芜的花园里,
只剩下一朵迟开的蔷薇;

摘了它去吧,姑娘,
别在襟前,让它
贴近你的胸膛枯萎……

这同样是一首感情空虚阴暗的诗,它只能给人以颓废哀伤的感觉。对公刘来说,是和他过去的作品的风格极不相称的^[15]。

1957年12月,《萌芽》发表了张立云的文

章《斥公刘的情诗》，继续抓住公刘的这组爱情诗大做文章。文中说：“他的诗，不是引导人们为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斗争，而是号召人们沉溺于爱情，超脱尘世，去过那沉醉昏迷的颓废生活。”^[16]公刘的这几首难得的诗篇，成为了人们日后肆意歪曲攻击的靶子。

1956 年 11、12 月间，公刘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几首寓言诗，也成为了半年后为人们所常常提及的罪证。这是 1956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公刘在《文汇报》第 3 版发表的寓言诗《刺猬的哲学》《乌鸦与猪》：

刺猬的哲学

冬天来了，到处飘着雪花；
两位刺猬哲学家，
为了寻找食物，
抖抖索索的在野地里爬。

它们在路上偶然相遇，
彼此像绅士一样行礼如仪，
相互问过夫人公子的健康，
然后咒骂了一阵天气。

可恶的北风越吹越紧，
两位哲学家都觉得很冷；
不靠拢吧四面招风，
靠拢吧又实在螫人。

于是它们想出了一个聪明主意：
让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要过份的疏远，
也不宜过份的亲密。

可是天哪！这样怎能取暖？
如果各人只顾自己缩成一团？
丢掉这种刺猬的哲学吧，
应该掏出赤忱的心来交换……

乌鸦与猪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平凡的乌鸦，
脑袋非常小，
嘴巴非常大。

多一点点思想，
它就难以容纳；
只要看见什么，
立刻几里瓜拉。

有一天，它飞进了猪的家，
经过了一番观察，
便发表评论说：
可怕！可怕！呱！呱！呱！

猪听见客人喧哗，
连忙抬头问话：
亲爱的朋友，是什么事情
使得你这样激动？这样惊讶？

乌鸦啐了一口才回答：
呸！你简直黑得可怕，
如果我是黑色的，
我就决定自杀……

猪哼了一声说：先别夸，
我俩且到镜子跟前比个高下。
乌鸦毫不在乎的飞过去，
可是，猛一照，便破口大骂：

“这是多么严重的歪曲！
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
这个故事适合于缺乏自知之明的人，
他们的狂妄恰好证明了自己的虚假。

这是 1956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公刘在《文汇报》第 3 版发表的寓言诗《公正的狐狸》：

公正的狐狸

有一头狼想吃一只羊，
不料竟遇到坚决的抵抗，
几次三番的进攻失利，
肚皮反而被羊角戳伤。

这时候走过来一头狐狸，
他意要调停这次冲突，
于是先用尺子丈量过狼和羊的距离，
然后站在中间表明自己不偏不倚。

狐狸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
便向作战的双方严正宣告：
战斗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谁违反这一点谁就不公道。

接着他开始一一加以比较：
狼有许多牙齿，可羊的也不少，
爪子蹄子并无区别，反正都是脚，
然而狼没有角，因此羊角应该抛掉。
……

善良的羊轻信了这番甜言蜜语，
狼立刻扑上来把它撕个粉碎；
为了感谢这头公正的狐狸。
狼送给他一条血淋淋的后腿。

这是1956年12月7日星期五，公刘在《文汇报》第3版发表的寓言诗《驴子的反抗》：

驴子的反抗

在某些国家，有人欺骗群众，说什么帝国主义是可以被“说服”的，云云。

河岸上，矗立着一座磨坊，
有三头驴子常在这儿见面；

它们分别属于三个主人，
三个主人的心肠一般狠。

某一天，水磨突然坏了，
三头驴子都感到十分高兴；
能享受到这意外的清闲，
不免要说长道短聊聊天。

话题像流水一般，听其自然，
渐渐地，三头驴子对生活有所怨言：
粗劣的饲料实在难以下咽，
鞭子似乎也抽得重了一点。

谈着谈着他们决定要起来“斗争”，
为的是证明一下自己族类的尊严；
说不定主人们会大大受到感动，
因此而自动纠正以往的偏见。

采取激烈的手段会招来危险，
何况肩头负轭也早已习惯，
不如以苦行和死亡作为抗议，
从今后干起活来更要舍命向前……

在发表这四首寓言诗时，公刘当然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些诗作日后将会为自己带来危险，更想不到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会从这四首诗中挖掘出那么恶毒的寓意来。

1957年春，还发生了决定公刘命运的另一件事。总政创作室党支部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召开了向在“肃反运动”中挨过整的人员“赔情道歉”的扩大支部会。在支部书记虞棘的再三动员和劝诱下，公刘也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做了发言。公刘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并不想发言，无奈那位支部书记再三再四地动员，一直把工作做到了我的宿舍，临到会议结束的下午，又点我的名，并且使用了‘激将’法。也是我‘反动本性难移’吧，我到底憋不住还是讲了。”^{[7](P403)}

公刘回忆说：

在所谓的赔情道歉会上,仍旧是虞棘先生,一再劝我“吐苦水”,情词恳切。我“傻帽”一个,竟信以为真,便一通放言,除了把胡风一案比作“文字狱”外,还说了些“流弹乱飞,伤的尽是自家人”之类。1957年,这些话,自然又都成了“划右派”的根据,还让虞棘捡了个话把:“得志便猖狂”^[17]。

在另一篇文章中,公刘更详细地回忆了这一事件:

早在“大鸣大放拆墙填沟”之前,一次党支部扩大会上,我正面理解了支部书记的鼓励,谈了两条:一条是胡风一案,使我更懂得了中国历史——例如,什么叫文字狱,什么叫瓜蔓抄;另一条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最高等级的人道主义,因而有更多的人道主义,本属新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蒋介石反动派才不讲人道^[18]。

他在那次会上还说道:

我希望,从今而后,从上到下,都应该多一点人道主义。万万不能定了罪,再找罪证,先开枪,然后才了解是不是敌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流弹乱飞”,“伤了自家人”^{[7](P402)}。

这次发言,在半年后成为了公刘“右派”言行的一个关键“铁证”。当时苦苦诱导他的支部书记虞棘同志则这样批判他:“你以为党真的向你赔情道歉啊?不过是试一试你还翘不翘尾巴罢了!怎么样?到底是反动本性难移!自取灭亡!别人是爱莫能助的!”^{[7](P403)}

关于“肃反”与成为“右派”的关系,公刘在1999年曾有过这样的反思:

现在已经掌握的大量证据表明,“肃反”对象往往“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右派”,而不少当事人竟至今仍不知其所以然。在这里,政治,作

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的确可以说是臻于化境了。而大凡读过几本书,对肃反和反右两大运动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肃反”肃对了八万一千多人(其中有多年后彻底平反的潘汉年集团、胡风集团以及其他不出名的零星个案),肃错了一百三十多万人;而被肃错了的人,稍有倾诉,便又触犯了“攻击肃反运动”的“刑律”,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划作“右派”。实际上,这一决策,为完成在知识分子当中抓几十万“右派”的硬性指标,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源^[19]。

不过,这些反思都已是事后的后知后觉,1956年6月至1957年6月期间的公刘,仍沉浸在他作为一个著名诗人的使命里。他自认为是“奉人民之命写诗”,相信“诗人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他既有责任感,又有历史感,他能勇敢地为多数人发言”^{[20](P76)}。他在一首题为《因为我是兵士》的诗作中这样写道:

因为我是兵士,
我才写诗;
因为我写诗,
我才被称作兵士。

我的六万万人民,
正踏着二十世纪的脊梁前进,
在这豪迈的队伍中间,
我的歌,是活的传单。

1956年9月4日^[21]

他自豪于作为一名写诗的兵士的身份,他的诗也一再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甚至在当时就已经有了中国诗坛的“公刘时代”的说法。

陶孝国曾回忆说:

1957年上半年,我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进修,著名老诗人公木在给文讲所学员做报告时欣然谈到:中国的新诗歌运动,曾经有过一个艾青时代,今后将有一个公刘的时代。可以断

言,这也是当时众多文学工作者对公刘的祝愿和预期^[22]。

胡昭在《痛惜公刘》一文中,也曾回忆说:“公木先生生前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只有公刘堪为艾青诗歌艺术的继承人。”^[23]李鸣高也曾回忆道:“新中国文艺界的高官兼理论权威周扬先生,曾在一次报告中预言‘中国诗坛继艾青时代之后,必将出现一个公刘时代’”。^⑧

1954年10月,公木调至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副所长,据高昌在《公木传》一书中的记叙:

公木的确曾在文讲所的课堂里称赞公刘,说他是艾青的接班人,“将来会有一个公刘的时代”。这话不知谁传到公刘耳朵里去了,他在跟别人谈话时也流露出这种意思。公刘被揭穿为右派分子以后,《诗刊》要公木写这篇批判文章,公木却又以此为论据,讽刺公刘自高自大,“声言要开辟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冠诸其上的时代”^[24]。

公木对公刘的这番讽刺,见于他在1958年第1期《诗刊》上发表的《公刘近作批判》一文,其中这样提到:

刚刚出过两本薄薄的集子,便俨然以“大诗人”自居,把自己的诗称为“活的传单”;自己的名字刚刚为小部分读者所知,博得些许声誉,便飘飘然发出诳语:要开辟一个把自己名字冠于其上的“时代”^[25]。

公木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1957年7月,《诗刊》刊出了“反右派斗争特辑”,《编后记》中写道:“战鼓已经擂响,号角吹起来了!在我们编辑这一期的时候,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谋的一场激烈斗争,业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了……我们希

望全国各地的诗人积极地投入战斗,以雄健的歌声,火热的讽刺,更猛烈地战斗。‘诗刊’愿意提供它的篇幅给这伟大的政治斗争。”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在虞棘的领导下也随即响应号召,展开了对“右派”的批判。首当其冲的是当时被“借调”在创作室的部队作家樊斌,^⑨紧接着,便轮到公刘。据当时也在创作室的徐光耀回忆:

在斗樊斌的时候,创作室插空发了个打印文件,人手一份。题目毫无感情色彩:《公刘在“肃反”以后写的几首诗》,录有《怀古》二首,寓言诗四首,新诗两首。分别发表在《新观察》、《文汇报》、《诗刊》等处。只有最后一首长诗,不知何故,注有写作日月,而无发表处所。文件很干净,无一字说明。

公刘在“鸣放”中,对“肃反”表示过不满,但意见唔唔啾啾,说不上有多少“上纲”的东西,而这八首诗,却把他“扣”住了。

……

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知识越多越反动”,斗起来自然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大超过了樊斌。在“背靠背”会议上,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随着斗争的深入,报上“点名”的右派越来越多。于是,面孔板得越凶越好,牙齿露得越长越好,便成了统治会场的风气。突然,四川冒出个“反动透顶”的诗人流沙河来,喊得最响、批得最凶的是他的《草木篇》,说是一株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创作室顺风顺水,把公刘的寓言诗与《草木篇》排行,称之为《禽兽篇》。这样一搭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在反党上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哪怕公刘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了^[26]。

1957年8月25日,《诗刊》刊出了公刘的诗作《我们的生活向右派宣战》,没想到的是,发表后的第二天,公刘自己也被当作“右派”揪了出来。更令人难堪的是,在他开始被批斗的同时,之前他撰写的几篇批判别人的文章,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出来:1957年9月,《新港》刊出公

刘的诗作《粉碎章罗集团的恶性“大发展”》，斥责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阴谋集团“妄想分庭抗礼”；1957年9月1日星期日，公刘在《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文章《斥“大风歌”》，批判张贤亮的抒情诗篇《大风歌》。关于这后一篇文章，公刘在1985年3月23日曾这样回忆道：

我讲我自己的一件丑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取道西安去敦煌采访著名画家常书鸿，正赶上《这是为什么？》和《工人阶级说话了》等“反右派”的檄文发表；西安作协一位已故的长者嘱我著文批判张贤亮同志的诗篇《大风歌》，我读来读去，觉得无从下手，实在“批”不成，便托辞旅途仓促，容后补寄，走了。九月份，总政文化部三封急电将我从河西走廊召回北京，刚下火车，《诗刊》便来电话，要我“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开始感到气氛不对，不表态是不行了，立刻匆匆忙忙写了一篇《我们的生活向右派宣战》，结果出了一个大洋相。事后方才明白，当时人家早已内定我是“右派”，只等开斗争会了。

去年，在第四次作家代表会期间，我认识了张贤亮同志，他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小说家，不是当年写《大风歌》的无名小辈了。我找到他诚心诚意检讨那件他并不知情的往事，他却毫无反应，大概是认为不足挂齿吧。我可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是我生平的奇耻大辱，必须时刻引为鉴戒。对别人的过失不能耿耿于怀，然而，对自己的错误却应该耿耿于怀。我把这件事白纸黑字地公开出来，目的也正是在于帮助年青的一代全面地、准确地、历史地认识一个诗人，从而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而至于中国。

1985年3月23日于合肥^[27]

或许正是因为屡有这样的违心之作，就是他在“归来”之后反复强调“诗与诚实”^⑩的关系，强调诗要“写真实”的灵魂根源吧。

关于公刘1957年8、9月间所经历的这番完全没有料到的窘境，他在1991年2月4日撰

写的《无论是“得”是“失”都充满了忧伤》一文中曾这样回忆道：

1957年8月，我被三封电报召回北京。当时我和黄宗江先生正在甘肃敦煌，打算合写一部以画家常书鸿先生为模特儿的故事片。同时收到的，还有一封《诗刊》的约稿信，嘱我立即“以诗的投枪与匕首，投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战斗”。

老实讲，甚么人是“右派”？他们又是怎样“猖狂进攻”的？我的认识是模糊的。我没有“大鸣大放”过，出差三月有余，行止不定，也不曾系统地读报纸。突然要求我以诗表态，当然要搜索枯肠。可是，直觉告诉我，不表态是不行了，于是，趴在车窗茶几上硬“憋”出首诗来，它就是发表在诗刊9月号上的《我们的生活向右派宣战》。

车停前门站，第一件事便是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入邮筒。

这可闹了大笑话！无可挽回！诗刊发表之日，也正是党报、军报欢呼右派诗人公刘现出本相之时^{[6](P67-68)}。

1957年9月28日，公刘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恰恰也是同月，此前已经编辑好的诗集《在北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公刘对这本诗集很看重，在一次接受访谈时，他说：“五十年代上半叶，我只不过是中国文坛天空中的一颗彗星，一眨眼便消逝了。尽管也出版过几本诗集，但稍稍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在北方》一本。”^[28]这个月对他来说，可真是喜忧参半，令人难堪。

1957年10月13日，《文艺报》第27期（总第197期）发表了署名为何施良的文章《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诗人”——记总政治部宣传部创作室对右派分子公刘的斗争》，从“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他的一些诗文是向党射出的毒箭”“与吴祖光反动集团骨干分子田庄等人过从甚密”等三个方面详细地“记录”了公刘的“右派”罪

行。1957年10月5日星期六,《人民日报》第3版右下角“在反右派战线上”栏目中,又刊发了一篇题为《右派诗人公刘现形》的短文:

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诗人公刘的右派原形。公刘在大鸣大放期间对党做了一连串的攻击,他把党比作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认为:“共产党对敌人的警惕已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政治运动是毁人”,谩骂肃反运动的积极分子是“盖世太保”、“迫害狂”。去年12月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共逆流时,公刘也随着叫嚣并向组织上提出“申辩书”,企图推翻党对他的历史问题审查的结论。

公刘写了很多反党的东西。他在去年第二十二期“新观察”上“怀古”一诗中写出:“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报国无门,何处能跃马杀敌?”“胡尘滚滚,难见中原风貌”等恶毒的字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刺猬的哲学”、“乌鸦与猪”等都是寓意明显的影射肃反和攻击党的诗。公刘与吴祖光的“小家族”过从甚密,一起散布流言蜚语。

上述两篇文章,相当于两张权威的宣判决书,决定了公刘此后20多年的屈辱命运。需要补充解释的一点是,这两篇文章中提及的公刘与“吴祖光集团”的罪名,主要是指他与好友田庄的关系。田庄原名王开时,当时是北影厂一名普通的编辑。他于1940年9月考入四川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5年5月离校奔赴解放区^[29],在东北完成了接管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任务后,又到北京参与筹建新中国的电影局。1955年他被划入所谓“二流堂”,成为“吴祖光集团”的一员,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1980年春节后去世。杜高在《〈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一文中,曾这样回忆了田庄逝世前的一幕:

田庄是1980年过了春节去世的,死时不满52岁。1979年,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

家族”右派集团冤案得到平反改正,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通知田庄在“改正书”上签字。他骑上一辆破自行车飞一般地奔到北影,拿上这份盼望了二十多年的改正书回到家中,或许是过于劳累,或许是过于激动,或许是郁积于心头20年之久的悲苦一齐涌上心头,他忽然呕血,怎么也止不住,呕了满满一脸盆。他被抬到了积水潭医院。他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了几个月,直到微弱的生命火花全部燃尽^[30]。

1955年,田庄与初到北京的公刘成为好友,还曾陪同公刘去拜见聂绀弩先生,公刘也因此与“吴祖光集团”有了关联,更有了与反动集团“过从甚密”的罪证。

在公刘被定为“右派”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坦白交代”和“深挖狠批”。1957年11月12日,《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11期发表了戏剧家、总政文化部文艺创作室负责人虞棘的文章:《公刘仇视什么?宣扬什么?》;1957年11月16日,《新观察》1957年第22期发表了柳杞的文章:《浩然巾下面的脸相——批判公刘的“怀古”诗》;1958年1月25日,《诗刊》1958年1月号发表公木的文章:《公刘近作批判》;同月,一个署名丘山的作者,在《北京文艺》发表了文章:《公刘在他的“小夜曲”里宣扬了什么?》。

“虎落平阳遭犬欺”,各种各样的污蔑随之而来。在《边疆文艺》1957年11月号第41页上,一位署名“水”的作者发表了这样一首诗:

“公刘时代”的歌 ——仿解放军文艺9月号“河西行”

我公刘,盖世太保的干儿子,
带着一身个人奋斗的辛劳,
来到兰州市中心区,走近交通岗,
我不要左派挡道
给民警一个耳光,然后把他推开身旁
正是我,站在全国地理位置的中心,
正是我,站在右派诗歌王国的中央。

我宣告：“公刘时代”来到！

升起刘家旗，敲起刘家鼓。

于是我梦见了人群掀起彩色的波浪

各路口音，各路的梳妆

万千捧着鲜花的读者和批评家向我奔跑，

万千劳动者送上万千车辆的奶油和面包……

于是，少年公刘发育异常，爆破了一身窄小的伪装！

原来英姿飒爽的战士形象，此刻却已经成为了人们肆意嘲弄的对象。因为被划定为“右派”，人们似乎也就有了把他当作攻击靶子的充足理由。公刘的一首题为《夜半车过黄河》的诗歌，此时也被人们挖出了罪证。这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夜半车过黄河，黄河已经睡着，
透过朦胧的夜雾，我俯视那滚滚浊波，
哦，黄河，我们固执而暴躁的父亲，
快改一改你的脾气吧，你应该慈祥而谦和！

哎，我真想把你摇醒，我真想对你劝说：
你应该有一双充满智慧的明亮的眸子呀，
至少，你也应该有一双聪明的耳朵，
你听听，三门峡工地上，钻探机在为谁唱歌？

这首诗成为罪状之一，竟是因为有人说“父亲”是对毛泽东含沙射影^[31]。

面对着种种匪夷所思的人与事，公刘十分痛苦地说：“我不再是人民的战士了，相反，我成了人民的敌人。对于这样一种剧变，我痛感无从适应。我所能做出的唯一的调整是：沉默，任人唾骂而不抗辩。”^{[20](P77)} 1980 年，在他被平反后，曾这样回忆道：

一九五五年肃反审查中，我曾经有过委屈，觉得不如死去，不过，打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却逐渐达到了两个结论：其一是，我绝不用自己的手

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耳闻目睹了许多事例：人被整死了，还落个“畏罪自杀”的骂名，甚至在棺材上涂些“革命口号”。其二是，我还真想睁大眼看一看大大小小的倒行逆施者们的下场^[32]。

选择了忍辱负重地苟活下去的公刘，与他的幼女相依为命，开始了 20 多年颠沛流离、备受摧残的流放生活。他在总政创作室的那些同事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为创作室首位被批斗为“右派”的樊斌先生所作的简传中，曾这样描述道：

总政创作室 1956 年组建，1958 年撤销，短短两年时间，貌似为反右运动而生，一群怀揣梦想的才子佳人，纷纷倒在铺满鲜花的路上。剔除生病的、长期在外以及秘书等工作人员，不到三十人的创作室，竟然收获右派八人、中右七人的战果，受处分人数过半。樊斌、公刘、白桦、徐光耀、艾炎、何礼德、沈君默等七人划为右派，寒风、黎白、林予、韩希梁、张祖德等成为中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最后也成为右派分子，而樊斌的罪名之一，是对该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过意见，被冠以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33]。

如文中所述，1958 年 3 月，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也被划为“右派”，被迫离开总政。曾经组织批斗过樊斌和公刘的党支部书记虞棘，也“正是斗争他的积极分子之一”^{[6](P64)}。而虞棘本人，竟在不久后也成为了矛头所指。诗人白桦这样讲述了虞棘后来的故事：

向左转的战车，从来都不会装上刹车装置。创作室的积极分子们突然把矛头指向虞棘，指责他“一贯右倾，姑息养奸，使创作室的年轻作家都堕落为右派。”天啊！总政创作室刚刚成立一年多，虞棘哪有那样大的能量呢！虽然他的革命资历很长，抗战时期在胶东地区是一位权威的剧作家，几乎当地所有的秧歌剧都是出自

他的手笔。但在政治斗争面前,他是个很胆小的人,因为他太了解其中的利害了。虞棘当场昏倒,并立即送进北京医院,才没有继续对他施加压力^[34]。

1999年5月12日,公刘在病中写下了一篇散文《中国病人》,他在文中说:

我正是—个得了“中国病”的中国病人。所谓中国病,就是政治病。……何须调查,全中国像我这样得了“中国病”的知识分子,岂止万千!然而试问,一个人经得起多少次这样的折腾!个别知识分子死了固不可惜,只是从今而后,能否真的下决心不再制造“中国病”了?善待知识分子,正是加强综合国力的首要一条啊。这个愿望,当不为是奢求罢^[35]。

2001年7月23日,公刘在盛夏大暑日的杭州,又写下了《天堂心》—诗,结尾这样写道:

我已指天盟誓,敬请日月作证,
尔后,我必将我微不足道的爱
一点一滴妥为贮存,
我会在我干瘪的腔膛里,把握准
中间偏左的分寸,
像安抚一枚起搏器那样,
安放一颗微型天堂心——

爱,爱我的人民!
爱,爱我的人类!
爱,爱我的西子湖!
爱,爱我西子湖的众芳邻!
爱,爱我的红尘人间!
爱,爱我的人间红尘!
爱,爱我的天庭圣洁!
爱,爱我的圣洁天庭!

爱,才是天堂心的惟一内核!
爱,才是天堂心的全部生命!

写下了这首充满爱的诗篇的公刘,于1961年10月,摘掉了“右派”帽子,于1979年1月,获得了“平反”,于2003年1月7日,辞世。

在他离世后,他的好友邵燕祥用四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尊重珍薄”!

[注释]

- ① 公刘,1927年3月7日生,原名刘仁勇,后改名刘耿直,因“服膺于《诗经》中描写的那位先人公刘的人格力量,钦佩他的诚笃力行和艰苦卓绝”(公刘:《闲话笔名》),而为自己取笔名为公刘。1946年元旦,正式使用公刘这个笔名发表作品。
- ② 当时的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文学组有胡可、徐光耀、黄宗江、白桦、公刘、寒风、魏巍、史超、周洁夫、柳其辉、黎白、徐孔、张桂、杜鹏程、魏钢焰、沈默君、李瑛、舒凡等,美术组有黄胄、艾炎、关夫生、何礼德、张祖武等,戏剧家虞棘是创作室主任,魏巍是创作室副主任。
- ③ 公刘的父亲,刘瑞芝,时任江西省立戒烟(鸦片烟)医院负责抄写公文书信的文牍。
- ④ 徐君虎,1906年生,湖南新宁人。1925年在广州考送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蒋经国等人为同班同学。1927年回国参加北伐,因被诬为“赤化分子”入狱,出狱后蛰居新宁。1937年赴上海参加对日会战,全军覆灭,隐居广西经商。1938年春应蒋经国邀请赴赣助练新兵,任蒋经国的主任秘书,后因政见不合与蒋分道扬镳,历任湖南邵阳县、大庸县、新宁县县长。1949年起义,随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湘西南的战斗和剿匪工作。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协秘书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5年去世。
- ⑤ 据公刘在《毕竟东流去——追忆我在江西赣州邂逅蒋经国先生的始末》一文中的回忆,徐君虎在1990年和1991年,公刘两度去拜望他时说:“我当时判断,你(公刘)的家境要比他(万水生)家略强一点,我便决定认万水生做义子。其实所谓的认,无非是多公开承担一点责任,拉扯他一把,让我同时认两个,我自忖力量不足,结果会是谁也帮不上的。”
- ⑥ 这段话引自公刘《无论是“得”是“失”都充满了忧伤》一文。文中提及的史超,1921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38年8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之后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解放后在西南军区文化部创作组、总政治部创作室从事文艺创作。1959年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2019年4月22日去世。文中提及的刘大为,1926年生于河北唐山,原名刘全忠,1940年到平西抗日

根据地党校、抗大四团学习。曾任东北野战军纵队新华社随军记者,1949年后,历任空军文化部文艺科科长、总政文工团创作室创作员。2004年11月8日去世。

- ⑦ 在1957年出版社的诗集《在北方》中,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被标注为1956年10月8日,在1987年出版的《公刘诗选》中,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被标注为1956年11月8日。本文以为,作者早期标注的时间可能更为准确。
- ⑧ 这段话引自李鸣高的文章《痛失“公刘时代”——中国诗坛旧闻》,见《李鸣高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页。李鸣高的回忆可能有误,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周扬发表过类似意思的言论。
- ⑨ 樊斌,男,1926年9月24日生,1939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十四军辎重后勤物资供应副主任,完成解放西藏的后勤物资运输任务后,赴云南丽江休整时,在公刘的帮助下完成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后被“借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1957年被批为“右派”后,樊斌被发配到云南宾川县宾居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9月作为“摘帽右派”到云南省漾濞县医院担任副院长,文革中被免职,后主动要求到漾濞县脉地公社莲花山麻风病医院当医生,独创“保密疗法”。2012年12月27日去世。
- ⑩ 公刘在1979年第4期《文艺报》发表文章《诗与诚实》,其中谈到: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的诗就与虚假发生了联系;到了林彪、“四人帮”当道,他们干脆提倡“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于是,流风所及,有的诗,成了押韵说谎的艺术。时至今日,“四人帮”已经粉碎两年多了,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好诗,但虚假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参考文献】

- [1] 艾青.公刘的诗[J].文艺报,1955(13):47.
- [2] 公刘.艾青及其诗作[N].中国新报·新文艺,1946-12-24.
- [3] 公刘.神圣的岗位[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39.
- [4] 邵燕祥.合肥去来[A]//画蔷[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0:37.
- [5] 洪炉.画笔记:战争·人[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116-117.
- [6] 公刘.无论是“得”是“失”都充满了忧伤[A]//活的纪念碑——公刘随笔[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
- [7] 公刘.毕竟东流去——追忆我在江西赣州邂逅蒋经国先生的始末[A]//纸上声:公刘随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 [8] 陈沂.同老虎睡在一起是不行的[J].中国青年,1955(12):8.
- [9] 冰夫.世事茫茫忆公刘[A]//诗在你在——公刘纪念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7.
- [10] 顾工.年轻时,我热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04.
- [11] 朱小鸥.童心不泯黄宗江[A]//电影和电影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266.
- [12] 公刘.三祭岳坟[A]//活的纪念碑——公刘随笔[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16-17.
- [13] 唐祈.公刘的诗[J].处女地,1957(5):63.
- [14] 阳春.公刘先生在赣州[J].百花洲,2013(4):194-208.
- [15] 黎之.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J].诗刊,1957(9):102-103.
- [16] 张立云.斥公刘的情诗[J].萌芽,1957(24):4.
- [17] 公刘.触人痛思的《思痛录》[J].同舟共进,1998(9):38.
- [18] 公刘.孽缘——我和杂文的一段亲情[J].文汇月刊,1988(7):67.
- [19] 公刘.董狐之笔——朱正新著《1957年的夏季》简评[J].随笔,1999(1):60.
- [20] 公刘.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A]//诗人与诚实[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 [21] 公刘.在北方[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34.
- [22] 陶孝国.忆公刘——在江西作协公刘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A]//诗在你在——公刘纪念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6.
- [23] 胡昭.痛惜公刘[N].吉林日报,2003-02-08.
- [24] 高昌.公木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56.
- [25] 公木.公刘近作批判[J].诗刊,1958(1):100-108.
- [26] 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上)[J].炎黄春秋,2000(4):32-33.
- [27] 公刘.说说我自己[A]//公刘诗选(1945—1985)[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4-5.
- [28] 公刘.从四种角度谈诗与诗人——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问[J].文学评论,1988(4):4-13.
- [29] 田庄.剧专五年琐忆[A]//国立剧专·江安(江安文史资料总第七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江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94:203.
- [30] 杜高.《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A]//老照片(第四十辑)[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10-11.
- [31] 孙宪武.我与公刘的邂逅情缘[J].飞天,2004(8):82-83.
- [32] 公刘.《仙人掌》勘余杂感[A]//仙人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219.
- [33] 走进漾濞深山的麻风病医生——樊斌纪事[EB/OL].
http://help. 3g. 163. com/0402/16/1014/16/C3BPE9170402008V.html.
- [34] 白桦.我和胡风短暂而又长久的因缘[J].新文学史料,2000(4):110-120.
- [35] 公刘.中国病人[N].作家文摘,2000-02-04.